

于忠广 著

社会转型与 对农广播

THE RESEARCH ON RURAL RADIO DEVELOPMENT IN NEW ERA OF CHINA

中国  广播电视出版社
CHINA RADIO & TELEVISION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转型与对农广播 / 于忠广著. —北京: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043-5908-7

I. 社… II. 于… III. 农村—广播工作—研究—中国
IV. G229.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4429 号

社会转型与对农广播

于忠广 著

责任编辑 贺 明

封面设计 李 鹏

出版发行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电 话 010-86093580 010-86093583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 9 号

邮 编 100045

网 址 www.crtip.com.cn

电子信箱 crtip8@sina.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保定地质勘察院美术胶印厂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16

字 数 240 (千) 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43-5908-7

定 价 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一节 解析新时期对农广播	2
一、对农广播的内涵	3
二、新时期与对农广播发展机遇	4
三、新时期研究对农广播发展的意义	6
第二节 对农广播相关研究	8
一、关于农村社会研究的概述	8
二、关于传媒与乡村社会的研究概述	11
三、关于媒介研究概述	15
第二章 新时期对农广播的社会环境	21
第一节 社会转型与对农广播	22
一、农业社会与对农广播	22
二、中国乡土社会转型	25
三、农村社会转型的两种趋势	26
第二节 对农政策转型与对农广播	30
一、新时期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路	30
二、新时期国家对农政策的调整	32
三、新时期党和国家执政思路的改变	34
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35
第三章 新时期对农广播的媒介生态	38
一、信息化时代的媒介生态:多元并存的媒介格局	38
二、新传播理念下的广播改革:频率专业化趋势	40

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广播改革	41
四、广播改革视野中的对农广播	43
第四章 我国对农广播的历史与现状	46
第一节 我国对农广播的发展历程	46
一、萌芽期:中国近代对农广播发展	47
二、创建发展期: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农广播	49
三、完善期:改革开放后的对农广播	55
四、衰退期:“四级办”向“两级办”的转移	57
五、整合发展期: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57
第二节 当前我国农村的传播生态	58
一、人际传播	60
二、报刊	61
三、广播	61
四、电视	63
五、网络新媒体	64
第三节 对农广播在广播格局中的地位	65
一、发展格局不平衡:重城市,轻农村;重电视,轻广播	65
二、广播总体覆盖率提高,但有效服务不足	66
三、广播资源的分配不合理,农村地区信息水平低	66
四、从整体上看,对农广播节目比例低、实力弱	67
五、对农广播发展滞后的原因分析	68
六、对农广播的增长空间	70
第五章 对农广播的受众	73
第一节 社会转型视野中的农村听众	74
一、我国农村听众的基本特点	74
二、农村听众的阶层分化状况	76
三、转型期农村听众的心理特点	79
四、农村听众是传播领域的弱势群体	80
第二节 农村听众的媒介接触行为	82
一、新时期农村广播的进展	82
二、农村听众基本情况	84
三、听众特征	86

四、对农民收听行为的调查	89
第六章 我国对农广播节目的内容	94
第一节 新中国成立后对农广播文本变迁的两个时期	94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农广播	95
二、改革开放后的对农广播	99
第二节 改革开放后对农广播的内容	102
第一阶段:政治宣传为主,信息服务次之	
——计划经济的延续期	103
第二阶段:对农报道思维模式的转变阶段	
——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期	107
第三阶段:农村广播功能的深层开发期	
——农民为主体的多元互动有效服务期	111
第三节 对农频道个案研究	129
一、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频道	129
二、安徽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	134
三、其他农村广播频率概况	137
第七章 新时期对农广播的功能	140
第一节 新时期对农广播的发展目标	141
一、主流媒介的含义	141
二、对农传播主流媒介特征	143
三、对农广播成为农村社会主流媒介的基础	144
四、对农广播成为农村社会主流媒介的方式	146
第二节 对农广播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152
一、新时期对农广播的功能	152
二、对农广播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155
第八章 国际农业广播发展参考	160
一、美国的农业广播	160
二、BBC 的农业广播	169
三、澳大利亚的农业广播	170
四、发展中国家农业广播网	171
五、非洲的农业广播	172

六、印度的农业信息体系	174
第九章 建设多元化的对农广播服务体系	
——新时期对农广播发展模式与趋势	176
第一节 对农广播公共服务体系评价	177
一、解析新时期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	177
二、现有体制框架下的问题分析	179
三、新时期我国对农广播服务体系的设想	180
第二节 我国对农广播发展模式的思考	182
一、对农广播服务的模式选择	183
二、对农广播服务的两种转变趋势	187
三、对农广播的发展方向	190
四、对农广播发展中人的决定性作用	193
参考文献	196
后记	200

第一章

绪 论

2003年“非典”期间,一些地区的不法奸商封锁市场信息,以日本市场抵制中国进口蔬菜为由,将蔬菜收购的价格压低,原来每斤一元的大葱竟然被压到每斤五分钱,农民蒙受巨大损失。

2005年6月,黑龙江省宁安县沙兰小学因洪水袭击造成105名学生死亡,原因是报警电话没打通,洪水到来的消息没有及时传播出去。

2006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节目报道了一位贵州山区的农家妇女,当夜里山洪到来之际,她挨家挨户地通知村民这个生死攸关的消息,拯救了全村人的生命,自己却被洪水冲走,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类似的例子在我国广大的农村地区并不少见,因信息不畅造成财产、人员损失的报道屡屡见诸新闻媒体。在我国偏远落后地区,信息的流通仍然处于十分落后的人际传播状态,不仅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低下,而且信息传播渠道极其匮乏,这种状况有时会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试想,假如有关部门能够及时把山洪暴发的消息传递到那个山村小学,让学生们及早撤离,那么一百多人丧生的悲剧将不会发生;假如山村里能有一个广播大喇叭将山洪暴发的消息及时广播出去,那位农妇就不必挨家挨户去敲门通知,从而争取了逃生的时间;假如农民可以通过正常的渠道获得市场的准确信息,不法奸商也就无法操控价格,农民的利益就可以得到维护。在新时期,建立完善有效的农村信息传播体系是促进农村社会发展、保护农民利益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

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农村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基本解决了农村人口的温饱问题,有些农村地区开始向富裕社会迈进。有社会学家认为,我国农村社会今后的发展,传统的以缺衣少食、基本生活无保障的生存型贫困,将随着农村经济发展和基本生存条件的改善而基本解决,代之而起的是由信息匮乏、人力资源流失、社会资源与支持网络不足、政策偏差、文化教育和权利保护缺位以及农

村生活价值的失落等因素而导致的新型贫困。^① 这些阻碍农村发展的新的因素,本质上都与信息匮乏有关。农民由于信息匮乏而处于市场经济的弱势地位,不得不依附于社会强势集团并受其支配,无法根据市场变化来组织生产,受到中间商的剥削无法获得合理的利润,进而无法积累资金获得改变自身命运的机会。另外,由于来自政府高层的声音受到传播渠道不畅的阻碍,农民对政策的理解和执行都受制于基层管理部门,农民无法真正参与其中,无法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缺乏对政策的效果判断,这也是长期以来农村社会资源和支持网络不足、政策偏差、权利保护缺位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农村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必须要解决农村信息传播的弱势地位问题。作为一种对农传播的重要力量,对农广播应该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

中国成体系的对农广播(有线广播)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于70年代,成熟于80年代,在90年代中后期,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中国对农广播呈现出衰退趋势,直至今日形成了广播格局中对农广播的边缘化生存态势。这不仅表现在我国专业的对农广播频道数量少、节目少,还表现在广大农民群体接触和利用广播媒体的能力弱、渠道少,对农广播服务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容易成为市场经济比较效益下的牺牲品。在当前我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这种状况不利于解决历史积累下来的“三农”问题,还有进一步扩大信息享用的城乡差距的趋势。对于新时期我国正在推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说,农民群体在信息享用上的弱势地位,也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不利因素。

第一节 解析新时期对农广播

广播(Radio Broadcasting)^②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在美国,广播诞生之后首先是应用于农业部门和乡村地区,其形式主要表现为一些无线电发烧友通过广播联系他们分散在乡村的家庭和亲戚,也和一些情况类似的城镇家庭开展横向的联络,广播从一开始就把触角伸向了农村。美国最早的广播试验发现,最主要的听众是在农业人口和农村地区,早期的广播主要是应用在乡村和农场。^③ 最早的无线电广播内容是美国农业部和美国气象局对农村地区的报道。

① 钱宁:《农村发展中的新贫困与社区能力建设:社会工作的视角》,载于《社会学》2007年第4期。

② Radio Broadcasting一般指无线广播,即通过微波发射并以收音设备接收的广播技术。

③ Robert L. Hilliard - PhD, Columbia University, New York:《Farm and Rural Radio: Some Beginnings and Models》。

从广播在中国的发展历程来看,虽然广播起源于城市,但是由于中国特殊的国情,广播真正发挥作用的地区最先是在农村。早在1930年,中国的一批平民教育家就在河北定县开办了中国第一家对农广播电台。^① 新中国建立后,广播作为最有效的大众传播工具,也是对农村进行宣传的最重要的工具。

一、对农广播的内涵

对农广播是指以农村地区居民为目标听众,以农业、农村和农民的生产生活及社会活动为内容的广播频率或广播节目。

作为一种传播活动,对农广播同样涉及两个基本要素——传者和受众。对农广播的传者是对农广播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即它的行为主体,包括对农广播频率及节目的记者、编辑、播出机构、管理和合作部门。对农广播的受众即那些居住在农村地区从事农业生产的人,也包括那些虽然已经脱离了农村和农业生产,但在身份上仍然同农村有密切相关性的群体,还包括那些与农业和农村、农民有极大相关性的城市居民。随着农业经济与城市经济之间的相关性越来越强,农业和农村也越来越成为城市居民关注的内容,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等问题。

对农广播的概念有一个发展演变的过程。广播最初并没有专门的对农频道,对农广播指的是面向农村地区听众的广播节目,内容涉及国家的农业政策、农业生产、农业科技推广和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随着社会环境变化和广播改革的深入,广播向专业化方向迈进,对农广播作为一个专业的广播频率分离出来,成为广播“窄播”之后面向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专业广播频率。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定义,农业是指人们通过劳动去强化和控制生物的生长,以取得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的生产部门。^② 从这个定义来看,首先明确了农业的主体是社会分工中从事农产品生产的那部分人;其次明确了农业是一个生产部门,其目的是生产符合社会需要的农产品。从这个角度看,对农广播至少应该关注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参与农业活动的人,二是农业部门中人们的生产活动 and 对象。今天的农业已经成为与市场经济紧密相连的大农业,参与农业活动的不仅仅包括了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和林业、渔业、畜牧业等劳动者,还包括了与农业产业链相关的一切生产部门,比如农资生产和流通部门、气象部门、农业科技

^① 1930年由平民教育会开办的中国第一家对农广播电台“河北定县实验电台”。

^② 李云才、刘卫平、陈许华著:《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版,第158页。

工作部门、农业管理部门等,一切与现代农业相关的人和活动都应该是对农广播关注的对象。

从历史上看,中国社会发展的一切问题几乎都和农业、农民有关。无论是旧中国的民主主义革命还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的社会经济改革,无不是从解决农民和土地的关系问题入手,最终目标是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变落后的农业国家为现代化的工业国家。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推动社会改革和进步的重要力量,广播在教育、鼓动和指导农民方面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前,虽然我国的社会环境和广播媒介格局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对农村、农业和农民来说,广播仍然是一种不可代替的信息媒介。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农广播更承担着不同以往的责任和义务。

二、新时期与对农广播发展机遇

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以内部机制性调整为主线的改革之路,这个调整首先是废除人民公社,在农村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给农民土地的使用权和生产自主权,由此带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效率低下的问题。

实际上,这种改革是在“吃饭”问题逼迫下的无奈选择,还不是一种自觉、理性的选择。在农村改革取得显著成果以后,我国经济改革的思路逐渐清晰,并很快引入到社会整体经济范围内;从思想上解决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提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只是一种经济发展的模式选择,而不是社会制度的性质问题;从发展思路逐步退出计划经济体制,实行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经济发展模式。2001年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最终确立了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改革开放推动了我国经济得到快速的发展,GDP增长速度保持了较高的水平(年平均增长率超过7%)。2003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标志着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经济发展推动着中国社会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的转型。

根据社会学后现代化的理论: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是现代化阶段,从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是后现代化阶段。^①中国目前正处于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中国社会能否顺利实现现代化,关键在于农村的现代化。根据国际经验,

^① [美]殷格·哈特:《现代化与后现代化》,1997年版。

这个阶段应该是工农业平衡增长、协调发展的阶段,是开始城乡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的时期。对于我国来说,是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的发展时期。^① 因此国家开始调整对农政策,财政支持力度向农村和农业倾斜。

从2004年以来,党和国家在对农村的政策上开始发生显著变化,主要体现在:实行以农村税费改革为核心的国民收入分配关系改革,主要是减免直至最终取消农业税,使农民负担大为减轻;实行对种粮农民的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农资综合补贴以及退耕还林补贴,使农民得到了国家财政的直接支持,贯彻国家对农民“多予”、“少取”的方针,体现了统筹城乡发展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向。党的十六大以来,国家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都是基于加速农村社会发展、实现社会整体进步的考虑。^②

作为党和国家对农村宣传的重要力量,广播一直以来担负着重要的责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广播对农村宣传的内容、方式和策略都不相同,对农广播自身的环境和发展方向也不相同。国家对农村政策的变化,不仅对广播今后“三农”问题的宣传导向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对农广播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和媒介环境。广播必须适应国家对农政策的变化,及时调整发展战略,在促进农村社会和谐发展的同时,找到适合自身发展壮大的模式。目前我国对农广播体系的建立尚处于整合发展阶段,没有形成规模,功能发挥有限,且存在诸多问题。如何建立稳定有效、运转得力、服务灵活、符合国家农村发展目标的对农广播服务体系,需要从财政、机制、市场等各方面加以深入研究。

研究新时期对农广播发展问题,应当清晰地看到对农广播与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之间的内在关系。2003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美元,这对我国社会来说是一个标志性的时间点^③。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00美元之后,经济社会发展就进入一个关键阶段。这个阶段是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剧烈变化、利益矛盾不断加剧、社会稳定问题非常突出的阶段。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会出现两种可能性:一是进入“黄金发展期”,保

①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当前,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初步具备了加大力度扶持‘三农’的能力和条件。‘十一五’时期,必须抓住机遇,加快改变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的局面,扎实稳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② 温家宝总理在2006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大历史任务,事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全局。要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推进农村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尽快使广大农村面貌有比较明显的变化。”

③ 国家统计局2004年1月20公布了2003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初步核算数据,当年我国GDP总量相当于1.4万多亿美元,人均1090美元。这是我国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

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增长,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一是进入“矛盾凸显期”,各种经济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差距扩大。因此,本书将新时期的时间界限划分为从2003年至今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在此之前中国对农广播的发展历程,是新时期对农广播发展问题的历史背景和基础。

三、新时期研究对农广播发展的意义

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带来了我国农村社会生态各个方面的显著变化:人们原有价值观正在发生嬗变,传统道德体系开始瓦解,新道德体系的培育过程仍未完成。非农经济得到一定发展,但经济水平总体低下。农民的角色发生变化,从过去依附于土地的传统农民开始向脱离土地、进入城市的现代农民转变,他们具有一定的开放视野,渴望接受先进文化,但同时又保留有农耕文化的封闭性和内向性。现代信息传播手段在农村地区都得到应用,但是从整体上看农村仍然是信息传播的低谷。

对于农村地区来说,广播仍然是一种不可或缺的信息传播媒介,它不受农民受教育程度的限制,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是一种最为低廉和方便的信息媒介,在防灾减灾、突发事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适于偏远地区的信息传递。研究新时期广播在农村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实际上就是研究广播在中国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目前来说就是对农广播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我们力图通过分析国家对农政策的调整与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从政治经济学角度考察对农广播在国家宏观政策调整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建立完善有效的对农广播服务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

根据发展传播学理论,虽然广播在媒介生态中的地位下降,但是并未失去其存在的价值,仍然是多元传播网络中的一元。与此相对应,广播长期以来在农村的主体地位已经不复存在,农村社会已经形成了多元立体的媒介生态格局。广播的发展目标不是企图重新恢复在农村的霸主地位,而是在于变“主体”为“主流”。主流不是一家独大,而是在媒介竞争中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力量,成为农村受众依赖的力量,权威可信的服务力量。

即使在农业高度现代化的美国等发达国家,农业广播服务仍然受到相当重视。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和非洲等第三世界地区,广播对农业更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现代化农业离不开广播即时、有针对性的信息服务,欠发达地区更需要广播(包括有线广播)的多种服务。具体到我国而言,“四级办广播”体制下的广播体系目前多已荒废,而新的对农广播体系尚未建成。在“村村通”工程的推

动下,2005年我国全国广播人口的综合覆盖率达到94.48%,^①农村信息享有的劣势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应该看到,对农广播长效服务机制的缺位、服务内容的贫乏并没有根本改善。在解决了广播对农村的覆盖问题之后,如何建立稳定长效、运转灵活、服务多样的对农广播服务体系,就成为一个十分迫切而实际的课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政府的重要目标,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需要利用各种资源,广播作为一种公共服务资源,应该提供更大的支持,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着国家对农村政策转型,广播也必然调整对农村的传播策略。从建设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大局出发,仅仅靠媒介自身的内部调整是远远不够的,国家应该实施不同以往的媒介政策。实际上,近年来对农广播发展滞后的根源,来自于广播体制改革及公共服务制度建设的滞后。覆盖不足、网络退化和内容贫乏、质量不高的症结在于没有一个良好的公共服务体制的保证。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若干意见》中,对于农村的土地、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农民合法权益保护等八个方面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是广播电视方面只在“繁荣农村文化事业”中有简单提及^②,这说明对于广播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的重要性的认识还需要提升。实际上广播不仅是新农村建设中的文化组成部分,还是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培养市场经济条件下新型农民的有力手段。制度安排的模糊性以及责任主体的不明确,造成对农广播体系实施过程中的困境。

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从制度上入手,建立有效的对农广播公共服务体制,保证对农广播在资金投入、网络维护、节目制作、人员培训等各个方面的到位。将对农广播公共服务制度由目前的软性政策转变为刚性政策,将其提高到关系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成败的高度。通过组织体系的建立、服务主体的明确、财政支持的制度化来保证对农广播功能的有效发挥。在城乡协调统筹发展的经济期内,我们应该建立不同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适应中国农业现代化进程和城镇化进程的对农广播服务体系。

中国正在经历或者说必将经历一个由农民社会向市民社会转变、由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变的过程。这是由经济力量推动的社会巨变,必将带动人们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和社会关系的巨大改变。在这个过程中,对农广播应该跳出传统的宣传教化的传播模式,通过构建农村社区的公共话语空间,引导农民成为农

① 《2006年中国广播影视发展报告》,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发展改革研究中心。

②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继续实施广播电视‘村村通’和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发展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基层服务点,构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村社区发展的主人,改变他们对外部强势社会的依赖,培育内源发展^①的模式。通过农民自身能力的培养和责任意识的培育,构建社区组织、培育社区领袖,通过赋权来增强农村社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只有农民成为了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并且有能力采取行动改变自己的命运,新农村建设才能取得实质的效果。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农广播必须帮助封闭、落后的农村居民树立现代的公民观念,融入主流社会,而不是让农民自发地整理和重建他们的精神世界。

第二节 对农广播相关研究

社会转型期的对农广播研究是当前广播媒介研究方面一个相对较弱的领域。在市场竞争压力下,广播的关注热点更多的在城市。尽管对农广播当前正面临国家政策转型带来的良好发展机遇,但业内重视的程度并不够,与其他领域的研究相比,无论发表的论文和专著还是从面向农村听众的调查研究来看,中国对农广播的理论和业务研究都显得十分薄弱。总体来看,国内外比较重要的研究一般是从新闻传播学与社会学交叉的角度研究大众传媒与乡村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涉及专门的农业广播媒体的研究还比较鲜见。在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背景下,有关农村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近些年呈现增长趋势,为研究新时期对农广播提供了比较好的基础,另外媒介理论的突破和创新也为研究对农广播提供了新的参考。

一、关于农村社会研究的概述

对农村社会问题的研究是研究对农广播的基础,许多研究者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对我国的农村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研究,为解析新时期的对农广播提供了基础的理论和知识准备。

早期的乡村社会学研究为我们看待今天的农村社会提供了历史的视角,例如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该书从社会关系、文化心理和经济模式上为我们分析了传统中国农村社会的乡土特色。传统乡土社会以土地为生产资料,以家庭小单位为基本存在形式,形成了一种超稳定的生产关系,人与人之间靠血缘和

^① 内源发展强调“发展必定是生长的人自己的一种行动(一种努力、一种创举等等)”,主张通过赋权和培育社区的社会资本,使其具有自我治理、自我发展的能力,而不是依靠外部力量的支持。见[阿尔及尼亚]阿卜杜勒·马立克著,黄高智译:《发展的新战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亲情形成一个差序格局,由于长期紧密地生活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而形成一种没有陌生人的“熟人社会”。这些特点形成了乡土社会内向性的人际传播模式。该书虽然成书较早,但其中的观点以今天的眼光看来,也还是适用的。中国农村社会由于发展的不平衡性,很多方面依然保留着传统农村社会的特征。

程铭贵先生的《农村社会学》是以中国农村为研究对象的另一本社会学作品。该书对农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等方面进行了分析,是一本规范的教材式读物。虽然当下我国农村社会从内部结构到外部关系都已经发生了比较明显的变化,但该书仍然可以为当下的研究提供较好的理论借鉴。

全面研究当下中国变动中的农村社会的是李育才等人编著的《中国农村现代化研究》一书。该书从我国农村的现实出发,指出中国农村的现代化是一种后发式的现代化,因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必须以非均衡发展的区域现代化推动宏观现代化,以人的素质的现代化带动全面现代化,以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高效发展相统一为基本价值取向的制度现代化,引导、规范农村经济社会现代化,以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降低农村现代化的成本。该书以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统计学多角度系统的研究中国农村的现代化背景、途径和方向,是研究当代农村问题比较重要和全面的成果。

在国家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乡村发展问题是当前我国社会科学领域研究的热点,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农村的现代化、城乡经济一体化、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方面。

冯继康、李岳云在《“三农”难题成因:历史嬗变与现代探源》一文中,从历史检索与现实反思结合的视角,系统探讨了中国“三农”难题的四大成因,认为导致我国“三农”难题持续存在并日渐恶化的根本原因主要表现在四个层面,即:市场因素——农业弱质性与市场风险性的双重制约;制度因素——二元经济结构转换的迟滞与历史惯性;国情因素——人多地少的中国特色;政策因素——重工轻农的政策偏向。这对当前我们考察农村社会的发展问题提供了基本思路,即农村社会经济文化的滞后主要是由国家社会发展政策的偏向造成的,因此新时期解决农村问题应主要依靠国家和社会的力量。

郑杭生和吴力子从社会转型的角度对“三农”问题进行了分析,例如在《“农民”理论与政策体系急需重构》一文中,他们同样认为,“农民问题”不是“农民的问题”,它是社会经济结构转型的产物,不是农民们造成的,因此仅仅依靠农民自身的努力是不可能解决的,必须依靠国家手段。但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树立这样的观念,农民问题经常被作为“特殊人群”问题来对待,或者被归结为“落后生产方式”,或者被归结为“乡土中国传统”,或者被归结为“愚贫弱私”。他们分析了现代农村经济和农民发生的变化,即农业经济与城市经济的相关性

增强,农民的市民属性增强。在新时期,解决农民问题需要国家在对农政策上做出调整,给予“三农”问题政策层面的支持。这些研究为正确看待新时期的农村问题提供了理论支持,也是分析新时期国家对农政策调整的依据。

对于新时期农民的研究也是社会学关注的重要方面,2004年,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林坚和马彦丽在江、浙、冀、赣、川五省进行了农民收入多元化和阶层分化专题调查。调查报告描绘了当前我国农村居民在职业、收入、社会地位方面发生的分化,指出目前我国农村的社会阶层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民的职业选择、收入、社会地位已经分化,农村社会总体结构呈现一个“类金字塔”型结构,而且分化过程仍在进行中。

社会分化中的农民群体也是一个研究的热点,许多研究者从保护弱势群体的角度出发,考察农民在社会阶层分化中的状况。如李春玲在《中国当代中产阶级的构成及比例》一文中对城市中的农民工阶层的生存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农民工由于缺乏相应的公民权利和社会保障而处于城市的底层,由于缺乏话语权而属于“沉默的大多数”。刘祖云的文章《阶层分化研究中的若干争议问题探讨》、吴波的专著《现阶段中国社会阶级阶层分析》也对当前社会分化中的农民群体进行了分析。就已发表和出版的文献来看,绝大多数观点认为,在社会阶层分化中,农民群体属于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需要国家从政策和体制上予以保护。此类研究为我们考察新时期广播的农村听众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张曙光、赵农的《决策权的配置与决策方式的变迁——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系统思考》一文,从政治学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农村私人决策和公共决策的现状和问题。该文从私人决策和公共决策的分野及其相互关系的角度,采取史论结合的方式,对我国的农村问题提供了一个理论上和逻辑上一致的解释,进而对当前的农村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检讨。指出当前农村由于私人决策和公共决策的混淆以及公共产品供给上的不公平待遇,使得农民承受了巨大的改革代价,却未享受到相应的改革成果。提出国家应该在私人决策和公共决策权力上加以区分,在公共产品供给上给予农民同等国民待遇。

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的马晓河、蓝海涛和黄汉权则从国际上工业反哺农业的经验出发,指出我国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阶段。他们在《工业反哺农业的国际经验及我国的政策调整思路》一文中提出,在新的社会发展阶段,应该从思想上高度重视农业这个弱势产业和农民这个弱势群体,适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力度,在制度上保障对农业和农民的支持,例如改革户籍制度,取消对农民进城和职业选择上的限制,给予农民同等的国民待遇,逐步取消城乡两极分化。该文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相应的对策。

对于新农村建设,有的研究者从国家整合的角度予以考察。徐勇在《国家整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文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更深刻的意义在于通过国家整合,从根本上改变农村状况,在业已分化的城乡差别的基础上重新构造城市与乡村的有机联系和统一性。因为现代化在造就城乡差距的同时,又在乡村动员中传递着一种平等发展的理念,赋予每个人以平等国民的身份,并由此构造民众(包括广大农村人口)对国家的认同。因此,作为一个现代国家,必须寻求一种缩小日益扩大的城乡差距的方式,以建构统治的合法性。

关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研究比较多,研究者们从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管理学的不同角度进行了多侧面的研究,例如《新农村建设与城乡一体化发展》(李善峰),《科学推进我国城乡二元结构转化》(梁桂全),《社会三大部门协调与和谐社会建设》(郑杭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应处理好八个关系》(龚培兴),等等。目前针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三农”问题研究的文章很多,以上仅仅列举了比较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和文章,其他不多作赘述。

二、关于传媒与乡村社会的研究概述

1950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学研究所对六个中东国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丹尼尔·勒纳在这次调查的基础上写成了《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提出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的基本理论模式,即世界各国的发展道路都将是传统社会经历过渡社会,最后进入现代社会,即发生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从专制政体向民主政体、从文盲文化向读写文化的转变。这一现代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农村的城镇化、教育和大众传媒的普及、公众社会参与性的加强。他尤其强调这个转变过程中人的现代化,认为大众传媒可以帮助人们突破地域的限制,开阔人的视野,培养人的现代性格。结合中国社会的现状,本书借鉴了勒纳的这一观点,认为当前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在这个过程中大众传媒对于培育新时期农民的现代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1964年,韦尔伯·施拉姆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托,撰写了《大众传媒与社会发展》一书,阐述了第三世界国家如何利用大众传媒促进社会发展的理论依据、发展战略和方式。他认为,信息传播在国家发展中具有社会守望功能、促进决策功能和大众教育功能,在推广农业新技术、推广卫生知识和食品安全、普及教育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应该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发展简单有效的媒介,促进社会进步。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媒介策略:发达国家大众传播媒介发达,多是大规模的现代化媒介,而发展中国家